

杨 国 荣 著 作 集

孟子的 哲学思想

杨国荣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杨 国 荣 著 作 集

孟子的哲学思想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的哲学思想/杨国荣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

(杨国荣著作集)

ISBN 978-7-5617-6998-0

I. 孟… II. 杨… III. 孟轲(前390~前305)—哲学思想—研究 IV. B22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43362号

杨国荣著作集

孟子的哲学思想

著 者 杨国荣
项目编辑 曹利群
审读编辑 王 毅
责任校对 胡 静
装帧设计 黄惠敏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6开
印 张 15.75
字 数 184千字
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
印 数 1-3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6998-0/B·461
定 价 27.00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目 录

1	引 论
4	第一章 生平与时代
4	一 少年时代
6	二 在百家争鸣中重振儒学
9	三 从奔走列国到潜心于教育
16	四 知言、养气及其他
22	第二章 天人之辩的价值内涵
23	一 历史的先导
27	二 从人文关怀到仁政构想
33	第三章 主体自由与外在天命的对峙
34	一 舍我其谁：自我力量的确信
37	二 天命的预设与自由的限制
43	第四章 理性原则的重建与强化
43	一 历史前提之一：孔子的奠基
46	二 历史前提之二：墨子的挑战
48	三 历史前提之三：《老子》的责难
51	四 回归理性主义
57	第五章 自我的完善与群体认同
57	一 拒杨墨

61	二	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
69	第六章	义利之辩
71	一	道义论的发端
74	二	墨法的崛起：功利原则的强化及其后果
77	三	惟义所在：道义论的凸出
81	四	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
85	第七章	权变的注重与独断的趋向
86	一	理论前导
90	二	从权变的确认到息邪说：走向独断论
95	第八章	现实与理想的二难：面向往古
95	一	现实的批判及其历史意向
98	二	与农家的分歧：文明社会的特征
101	三	理想在过去：面向往古
104	第九章	人格境界
104	一	仁智统一
108	二	品格与形象
111	三	人皆可以为尧舜
114	四	内圣的走向
117	第十章	性善说与成人之道
117	一	从性相近到性本善：提升人格境界的内在根据
125	二	成人过程与复性：回归内圣之境
132	第十一章	历史中的孟子
132	一	从儒到圣
139	二	溶入文化的长河

155	附录一	政道与治道
176	附录二	孟荀：儒学衍化的二重路向
190	附录三	儒学与德性伦理
207	附录四	《中庸》释义
242		后记

引 论

在中国历史上,孟子曾长期被视为亚圣,其地位居于孔子之侧。与孔子一样,孟子几乎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,而孔孟并尊,确实也逐渐构成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格局。

作为亚圣,孟子的历史影响首先与儒学联系在一起。儒学奠基于孔子,在孔子的时代,儒学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,其主张也远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。孔子之后,墨、道、法等学派曾对儒学提出责难和批评。到战国时代,处士横议,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趋于高潮,儒家的地位似乎进一步受到了墨、道各家的冲击,所谓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,天下之言不归杨,则归墨”,便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。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,儒学不能不作出理论上的回应。这种历史的需要,在

某种意义上将孟子推向了时代的前沿。孟子在战国时代有好辩之名,这种好辩往往带有论战性质,它在回应各种挑战的同时,又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儒学的深沉内涵与理论力量,正是通过正面的理论建树与积极的理论争鸣,孟子使孔子开创的儒学传统得到了延续,并进一步维护了其显学的地位。唐代的韩愈在追溯儒家的道统时,曾认为圣人之道从孔子而传到了孟子,换言之,孟子有承继儒家精神命脉的历史功绩。从儒学的衍化看,这一评价并不为过。

孟子的时代,历史开始进入了大一统的前夜(孟子之后一百余年,秦始皇便完成了统一大业)。作为思想敏锐的哲人,孟子已开始注意到这一时代特征,当梁惠王问他“天下怎样才能安定”时,孟子的回答便是:惟有归于一统,才能达到安定。以这种历史意识为前提,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构想,企望将仁政推行于天下。孟子的仁政主张包含了不少天真的幻想,难免有迂阔之处,但使天下普遍实行王道的理想,毕竟折射了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趋势,而其仁政观念对于抑制法家的暴力原则,亦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。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,儒家的道德哲学进一步展开为政治哲学,后者在历史上形成了难以抹去的影响。

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价值观念,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,更多地以价值观念为中介。在孔子那里,儒家的价值系统已具体而微。然而,作为儒学的开创者,孔子的思想还带有原始的浑朴性,这种浑朴性既使孔子避免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片面性,又使其不少观念未能具体展开。在上承孔子思想的同时,孟子从天与人,主体自由与超验之命,自我与群体,道德原则与具体境遇,功利与道义,以及人格理想等方面,对原始儒学作了多方面的引申和发挥,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。正是在孟子那里,以善的追求为轴心,强调人文价值,崇尚道德自由,注重群体认同,突出理性本质,要求人格完善等儒家的价值观念取得

了更为完备的形式,并趋于成熟和定型。如果说,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,那末,孟子则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儒学。

当然,孟子在展开孔子思想的同时,也凸显了儒学的某些负面趋向。在天人关系上,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原则固然得到高扬,并被赋予更为具体的内涵,但自然的原则不免有所忽视;在名实之辩上,理性环节获得了较多考察,但感性闻见则未能得到应有的定位;在力命关系上,道德领域的主体自由诚然被视为题中应有之义,但经天纬地的历史创造则又被淡化;在义利关系上,道义的内在价值一再得到强调,但功利的意识又被过分地抑制。此外,群体原则的提升与个体原则的相对弱化,拒斥异端所蕴含的独断趋向,现实的批判意向与往古的理想化之间的纠缠,等等,这些方面使孟子所系统化的儒学又呈现出复杂的意蕴,并相应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多重影响。

按传统的看法,儒学以内圣与外王为主题,在孔子那里,二者已开始得到双重确认。相对而言,孟子对内圣予以了更多的关注。尽管孟子本人并非远离经世之域,但其价值追求的逻辑归宿,则是内圣之境。他把自然(天)的人化主要理解为化天性为德性,将人的自由限定于自我的道德选择,凸出道义的内在价值,强调自我意识(良知)的功能,以求其放心为学问之道,等等,都处处展示了一种内圣的定向。在理想人格的设定上,这一思路表现得更为明显。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目标,在儒家那里,善的追求最后总是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,不妨说,正是人格的设定,集中折射了其价值取向。按孟子的看法,完美人格的根本特征,主要体现于其内在德性,自我的实现(从本然的我走向理想的我),首先便以仁、智等内在品格的形成标志,成人(达到理想人格)的过程则相应地以内在的善端为出发点,并表现为这种善端的自我展开。较之孔子及后起的荀子,孟子更多地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内圣之境,而儒学的内圣走向,也由此获得了其历史的源头。

第一章

生平与时代

春秋战国时期，邹鲁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。公元前 551 年，孔子出世于鲁国，一个多世纪后，与鲁毗邻的邹国诞生了另一位文化巨人——孟子。

一 少年时代

孟子，名轲，其生卒的具体年月，历来说法不一，根据《孟子》一书所载事迹，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385 年到 304 年之间。孟子的祖先是鲁国的贵族。鲁桓公的庶子仲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号称“三桓”，仲孙氏又名孟孙氏，而孟子即孟孙氏的后代。战国时期，曾经称雄鲁国的三桓，其地位已非昔日可比，孟子的先人不得不从鲁迁到了邹。

孟子虽是贵族的后代,但其少时,家道早已中落。童年时代,他的父亲又过早地去世,留下孤儿寡母,相依度日,孟子早年生活之艰辛,由此亦可想见。由于父亲早亡,生活与教育的双重责任,都落到了他母亲肩上。孟子的母亲对孟子期望甚高,为培养孟子颇费精力。根据流传下来的传记资料,孟子幼年时,他的家坐落在坟地附近,周围时有丧葬的队伍经过,并常常可以看到落葬的仪式,小孩往往喜欢摹仿,丧葬仪式接触多了,便自然而然也去学样,孟子幼时即常做丧葬的游戏。孟子的母亲担心长此以往,对孟子的健康成长不利,于是,迁居到较为热闹的集市附近。但集市是商贩活跃的地方,推销各种商品的叫卖声,几乎终日不断,时间久了,孟子也不免受其影响,注意力往往集中到学叫卖上。孟母见此情景,意识到商贩活动之地,也非孩子成长的合适环境,于是决定再次搬迁。经过一番考虑、选择,最后决定安家于靠近学校的地方。当时学校除传授知识之外,还注重礼仪的训练,身处这种环境,耳濡目染,幼年的孟子也渐渐对礼仪产生了兴趣,平时常常在桌上放些礼仪用品,做各种祭祀的游戏,并且摹仿揖让的礼节,举止颇合规范。在多次选择之后,孟母终于找到了一个教育孩子的理想环境,这一段经历,史称“孟母三迁”。^①

年岁稍长,孟子的母亲便设法使他接受当时较为系统的教育。开始,孟子并不很用功,常常把学习的功课丢在一边,到外边游玩。一次,孟子玩后归来,正好遇到母亲在家织布。孟母问他学习情况如何?孟子随口答道:也就这样罢!孟母看到他对学习如此漫不经心,十分生气,一下把织布机上的布割为两段。孟子见此情景,吃了一惊,忙问:为什么要断布?孟母缓缓地说:让你念书,获得知识,是为

^① 参见刘向《列女传》。

了使你成才,现在你荒废学业,不思上进,就像我割断布机上的布一样,只能成为废物。如果再这样虚度光阴,将来就惟有成为劳力者了。母亲这番语气沉重的话,对孟子触动很大。以后他便埋头于诗书之中,一心走知书达礼的正道。这段故事,历史上称为“断杼教子”。^①

孟母三迁与断杼教子的具体细节是否真实,现在已不可考。不过,孟子自幼受到较为严格的家庭教育,并主要在母亲的引导下走上诗书诵读之路,这恐怕还是事实。对照孟子后来的思想,其早年的这些轶事似乎不完全是虚构。《孟子》一书的第一篇便记载了孟子与梁惠王关于义利的一段对话,孟子的基本观点是: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。”从中,我们不难看到早年经历的某些影响:孟子对功利的鄙视,其源似乎可以追溯到孟母有意远离集市的商贾牟利活动,如果孟子始终定居于商贩云集之地,并在商贩的叫卖声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,其后来的观点与思路也许会另有一番面目;又假定孟子未能从游乐中猛省,则其尔后的圣人气象或许也不易形成。

二 在百家争鸣中重振儒学

严格的家庭教育,使孟子自幼便形成了认同儒家思想的倾向,从孟子儿时摹仿“揖让进退”之礼中,就不难看到这一点。稍长之后,孟子便入子思一系的儒学之门,开始接受更系统的儒家教育。子思是孔子的孙子,从师承关系上看,孟子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显然一脉相承。按《史记》的记载,孟子曾师从子思的门人,为子思之再传弟子。从思想倾向看,孟子与子思确实有较多的相近之处,也许正是有

^① 参见刘向《列女传》。

见于此,后世常常思孟合称。

不过,孟子虽然受学于子思之门,但其志向并不仅仅是弘扬子思之学,而是进一步上承孔子。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,《孟子》一书中赞美孔子的话几乎随处可见。在他看来,自从有人类以来,还未有一人可以与孔子相比,而他自己的愿望则是效法孔子。尽管由于时代的前后悬隔,孟子未能直接亲炙孔子,但却始终以孔子的“私淑”后学自居。平实而论,孟子也确乎可以视为孔子的思想传人。

作为一代大儒,孟子不仅致力于儒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完备,而且为光大儒学作了独特的努力。儒家学派虽然在春秋末年已号称显学,但随着诸子的蜂起及百家争鸣的展开,儒家逐渐受到了各种冲击,其显学地位也开始受到挑战。在孟子的时代,“处士横议”已成为普遍的现象,其中墨子与杨朱学派的影响尤为引人注目,“天下之言不归杨,则归墨”。^① 墨家学派在春秋末年已与儒家并称显学,它以“兼相爱”、“交相利”为基本主张,将原始的人道原则与现实的功利原则结合起来,从而既满足了人们对仁爱的渴求,又合乎人们求利的需要,在理论上颇具吸引力,其声势似乎已渐渐压倒了儒家。杨朱学派以利己为原则,突出了个体的权利意识,这在自我往往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战乱之秋,也自有其打动人的地方。此外,法家学派此时也已崛起,他们鼓吹耕战,崇尚暴力,这种学说较之儒家的仁道原则,似乎更迎合了大小诸侯的口味。

如果说,杨、墨等主张在理论上向儒家提出了挑战,那末,张仪之流的纵横家,则以其政治权谋,在实践上否定了儒家成圣的人格理想。他们或者主张“合纵”,即联合各弱国以抗衡某一强国,或者主张“连横”,即依附一强国以攻众弱国,其手段则不外乎玩弄谋略术数。

^①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

正是凭借谋术,纵横家们获得了权倾天下的地位。纵横家与儒家所推崇的圣人、君子,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,圣人与君子具有完美的德性,并注重以德性的力量去感化当政者,纵横家则常常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,甚至置人格廉耻于不顾。然而,在现实政治舞台上,扮演主角的并不是儒家的彬彬君子,而恰恰是以谋术见长的纵横家,从《孟子》一书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,与孟子同时代的景春曾当着孟子的面赞颂纵横家:公孙衍(主张合纵者)、张仪(主张连横者)真是大丈夫,他们一发脾气,诸侯也都害怕,平静时,则天下安然无事。纵横家的得势从一个侧面表明:儒家已受到了历史的冷落。

百家争鸣对儒家的冲击,以及儒家在现实政治中的边缘化趋向,在某种意义上使儒学走向了历史的低谷。如何重振儒学?这便是孟子所面临的重要时代问题,而孟学在儒学衍化中的地位,也与这一问题相联系。孟子本人对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自觉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孟子好辩,孟子的弟子公都子曾问孟子何以喜欢与人论战(好辩),对此孟子作了一番解释。他说:我之好辩,是不得已。孔子之后,天下再没有出现圣王。诸侯无所忌惮,在野的知识分子也横生议论,杨朱、墨翟的主张充塞天下,孔子之道反而难以发扬。从而造成邪说欺骗百姓、仁义的原则无法实行的局面。我对此深为忧虑,于是起而捍卫先王之道,抨击杨墨的学说,驳斥各种荒谬的观点,以端正人心,上承周公、孔子之道。^① 孟子的一生,确实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。

孟子对儒学的振兴,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。首先是通过发挥与深化儒家的基本观点,使儒学逐渐趋于完备和定型。作为儒家的开创者,孔子已大致奠定了儒学的基本框架,但它在理论上还有待于展

^① 参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

开。孟子由师从孔子门人子思,私淑孔子等等方式而接受了儒家的基本原则,由此出发,又进一步从天与人、群与己、主体自由与外在天命等关系上,对儒家学说作了系统的阐发,并使之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。可以说,正是在孟子那里,儒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内容,并进一步展示了其深沉的理论力量,后者不仅使儒学的传统得到了承继,而且使之在百家争鸣中保持了某种理论上的优势。

与正面的理论建树相辅相成的,是所谓“息邪说”、“放淫辞”,即通过论战,以拒斥儒家之外的各种学说与观点。前文已提及,孟子在战国时期有好辩之名,这里的辩,即是一种学术思想上的争论。纵观孟子一生,他几乎与当时各派都展开过不同形式的论战。在滕国,他曾与农家的陈相就社会分工等问题进行争论,肯定了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的合理性;当告子在人性问题上对性善说提出异议时,孟子反复诘难,以论证人性本善;听到景春盛赞纵横家,孟子立即予以回驳,以为公孙衍、张仪一味取悦诸侯,只是“妾妇之道”,根本不能算大丈夫;至于墨子、杨朱之说,孟子更是拒之不遗余力。总之,好辩的形式所内含的历史意义,乃是对儒学的回护和弘扬。

从先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看,孟子的一生始终与儒学息息相关。时代向儒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,孟子则通过正面的理论建树与“拒杨墨”、“放淫辞”,对这种挑战作出了历史的回应。孔子开创的儒学所以能挺立于百家争鸣之中,并得以延续和发展,确乎有赖于孟子的努力。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作用,使孟子几乎与孔子并列,成为儒家文化的象征,并在后世逐渐获得了亚圣的殊荣。

三 从奔走列国到潜心于教育

儒家并不是书斋中的思辨型学者,从孔子开始,儒者便抱有安邦

济世的志向,并时时关注着社会的治乱变迁。孔子曾数度出仕,在受挫于鲁国之后,又带着弟子周游列国,为实现其政治理想颠簸奔走于诸侯之间。与孔子一样,孟子并未囿于对儒学的理论阐述,而是力图将儒家的基本原则化为具体的政治主张,并进而将其推行于天下。

战国时代,历史进入了群雄角逐的阶段。诸侯之间或合纵、或连横,大小战争持续不断,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破坏。从总体上看,当时各国基本上已经或正在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,时代的主旋律已经开始从生产方式的变革,转向结束灾难性的彼此征伐,实现天下的安定。在某种意义上,战国可以说已经处于大一统的前夜,作为思想敏锐的哲人,孟子已明确意识到了这一时代特征。当梁惠王问他“天下怎样才能安定”时,孟子便回答:天下归于一统,便能安定。^①如何才能完成天下的统一?围绕这一时代问题,当时的诸子百家提出了不同的主张,其中的主要分歧存在于儒法之间。法家崇尚暴力与耕战,与此相联系的则是“霸道”;作为儒家的传人,孟子对法家的霸道深感不满,并作了种种抨击。在他看来,要使天下归于一统,根本的途径便是实行王道,而王道则具体体现于仁政。怀抱以上政治主张,孟子在中年以后开始游历各国,往返于诸侯之间,以求实现其仁政理想。

孟子出游时,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,门人弟子也为数甚众。根据孟子弟子彭更的描述,每当孟子出行,后面总是跟着数十辆车,数百名随行者,队伍颇为壮观。这种描述也许有些夸张,但孟子游列国时,已非贫寒之士,这恐怕还是事实。公元前320年,孟子首先来到魏国。当时魏国连年在军事上失利,先是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,魏军为齐国所败,数年后(公元前341年),魏伐赵国,赵国与

^① 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

韩国联盟,开始魏国进军颇为顺利,但后来韩国向齐求救,齐军采用围魏救赵之术,在马陵再次大败魏军,魏太子及大将庞涓均被杀。又过了若干年(公元前330年),秦、齐、赵三国联合伐魏,商鞅率秦军与魏军战,结果秦军获胜,魏国只得割地求和,紧接着(公元前327年),楚国又派兵攻魏,占据魏国八座城。接连的打击,使魏国迫切希望获得策略上的指导,以重振国威。孟子的来访,正是以如上变故为背景,因而梁惠王开始时对他颇寄厚望。但几次交谈,孟子都对他大讲仁义。当梁惠王问他,如何才能使魏国一洗数年战败之耻时,孟子的回答便是“施仁政”,而其具体内容则不外乎减免刑罚,减轻赋税,使人们都能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,为人尽心竭力,待人忠诚守信等等。在孟子看来,如果能做到这一切,便可以用木棒来抗击具有坚甲利刃的秦、楚军队,因为仁者必然无敌天下。对功利之心急切的梁惠王来说,孟子的仁政方案显然缺乏吸引力,除了表面上的敷衍外,梁惠王并没有把孟子的话真当一回事。

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,梁惠王便死了,接位的是其子梁襄王。孟子曾会见了人一次,出来后便对人说:梁襄王这个人望去就不像个国君的样子,与他接触,也看不出威严所在。因此,不久孟子就离开了魏国来到了齐国。当时齐国执政的是齐宣王,他一向好士,并特地在齐国都城临淄设立稷下学宫,广招天下名士,安排住宅,赐以大夫的俸禄,邹衍、慎到、田骈、环渊等都曾到过稷下,最盛时,整个稷下学宫几乎会聚了上千人。初到齐国,齐宣王对孟子敬若上宾,礼遇有加,齐国在齐桓公时,曾是春秋五霸之一,齐宣王很想恢复昔日的霸业,因而一见孟子,便向他请教齐桓公及晋文公在春秋时代是如何成就霸业的。孟子的回答是:孔子的学生从来不谈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迹,我也无从得知。如果你一定要我说,那末,我还是讲讲如何行王道吧。接着便开始劝说齐宣王保民而王,并具体介绍王道的内容。